

钟敬文的民俗学理论研究与社会活动

[文章编号]1001 - 5558(2002)02 - 0066 - 06

董晓萍

[摘要] 文章概括了我国现代著名民俗学家、社会活动家钟敬文教授在民俗学理论研究和活动方面的几点成就。

[关键词] 钟敬文; 民俗学理论; 社会活动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钟敬文教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民俗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他在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领域的活动和贡献，为我国学界所熟知和敬仰。他在绵长的生涯中，一直为民俗学学科的建立和提高而呕心沥血地工作。现就他在民俗学理论研究和活动方面的成就指出几点：

一、钟敬文民俗学理论研究的几个特点

（一）对民俗学理论建设的热忱

钟敬文教授在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民间文艺学的学术活动。经十年的搜集、探究，到 30 年代中期，他对广大人民口头创作的文学，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他认为，根据对象的特点，应该建立一种独立的学科，方能使它更好地发展。于是，他发表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艺风》月刊，1936 年），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卓见和努力的

西北民族研究

2002 年第 2 期(总第 33 期)

N. W. Minorities Research

2002. No. 2 (Total No. 33)

决心。80年代以后，他又一再对民间文学和民俗现象的科学体系结构的问题进行思考，作了《建立新的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和《关于民俗学的结构体系的设想》等学术报告，使这门学问的体系问题为学者所瞩目，并有利于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

（二）强调对民间文学特点的重视

民间文学，既是文学现象，又是民俗现象。从前在学术研究上，虽然民间文学被学者（主要是民俗学者）列入民俗学的范围，但是，他们在实际研究上，特别是一般文艺学者、文学史家在研究上，不大注意到它本身具有的特点，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去用一般文学的规律去对待它，把它等同于一般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这种现象，在文学史家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钟敬文教授由于深入这种民众创作的实践，便感到非着重指出它的特点不可。自70年代后期以来，他在一些学术报告和论文中，针对那种含糊不清的观念，大声疾呼，希望唤起学者们的注意。同时，他还指出，对这种特殊文学的理解和研究，必须具有那些相应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参看《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民间文艺学文丛》，1982年等。）这种理论上的阐明，对于澄清民间文艺学学科中的模糊观念，曾经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较早地制出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民间文学，主要是依靠口头传播的文学，是一种传承的文学。它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要经历各种不同时代和不同心理的人们的传述和修改。因此，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它的散文叙事文学（如故事），经过这种过程，要产生出许多异文。研究者为了探究它，就要把许多异文归纳成“类型”，以便进一步进行研究。这种故事类型学，由于芬兰学派的提倡和传播，已经广泛地流行于各国民俗学界，成为故事研究上的一种重要的方法。上世纪20年代后期，钟敬文教授曾与杨成志先生合译过约瑟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修订的《印度欧罗巴民间故事类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小丛书，1928年），因而兴起了制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念头。30年代初，他就当时个人所能接触到的资料，草成了五十多个类型，初刊于《开展》月刊的“民俗学专号”，后译载于日本的《民俗学》月刊（1933年）。后来德国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37年）和丁乃通（Nai-tung Ting）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年）相继出版，日本、韩国学界，也先后都有关于本国民间故事类型的著作出现（日本且远不止一种）。这些中国及邻国的民间故事类型的著作，都比较详尽，但是，从时间上说，钟敬文教授对故事类型的制作，是较早的尝试。已故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教授，晚年在给自己编纂的《日本民间故事集》的中译本作序时曾说，他注意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跟阅读了钟敬文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日译文有直接关系。可见，钟敬文教授这种早期的故事类型的制作，在亚洲民俗学界是有一定影响的。

（四）提出中国文化三层说

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民族，它的国民文化大都是有层次的。中国古代学者所强调的“雅”与“俗”，“五四”时期学者所常说的“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都是一种对民族文化层次的看法。这种二分法，在西方学界也有类似见解。但是，钟敬文教授根据他多年实际观察的结果，提出了三分法，即认为中国文化有上、中、下三个层次。据他的解释，

上层文化，指过去社会的地主阶级——主要是以贵族、士大夫和附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为代表——所拥有和传播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经典文化，或精英文化；中层文化，指唐、宋以来，都市发达，从而居住在那里的市民——商人及各种附着于它的城市居民——的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元明以来流行的戏曲小说和时调俗曲等都属于它的范围；下层的文化的享用者是农村的大量农民和小市镇的手工业艺人等，他们的文学种类，就是口头文学。这三种文化的主人，是社会地位、身份、教养等不同的各类群体，他们的文化，当然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彼此不同，甚至于互相碰撞。但这些不同文化的主人，又生活在同一个大群体（民族、国家）里，他们相互依存，乃至利害相关（如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这样，他们的文化，就不能不有其共同的地方。所谓民族的凝聚力，正是从这里发生的。因此，他们的文化既有互相差异或抵触的一面，又有互相融合或一致的一面。随便强调哪一点，都是不全面的。钟敬文教授的三分法，要比二分法细密些，也比那些只强调一点的说法要符合事实一些，因而得到了国际国内学界有些同人的认可。

（五）倡立民俗文化学和建设中国民俗学派

民俗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贴切人民生活的、范围广泛的文化现象。它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正像水对于鱼的关系一样。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钟敬文教授着手探讨《山海经》，拟写成一部专著的时候，书名就定为《山海经之文化史的探究》（后因故只完成局部篇章）。他把《山海经》所记载的许多远古信仰、古代科学知识及神话传说等，都看作文化现象，他的观念是很明确的。他后来所写的文章也多透露着这种意思。80年代以后，随着他对学科不断探索和国内文化学的兴起，他的这种学科意识更为明显。近年，他明白地提出了“民俗文化学”的学科名称，一方面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中阐明这种学科的抬头（《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1989年），另一方面又对它的学科性质、特点和作用等做了初步的概括论述（《民俗文化学发凡》，1991年）。在我国，这种学问，虽然还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响应者还限于部分学者，但是，由于它本身成立的充足根据及它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它得到了迅速成长。90年代末，钟敬文教授正式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主张（《建立中国民俗学派》，1999年），表现了他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学术远见和创新勇气。

（六）对民间口头叙事文学的研究成果

钟敬文教授的民俗学研究是从民间文学开始的。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在搜集和整理歌谣、故事的同时，就开始这方面的理论考察。最初，是对于民间歌谣，接着，是对于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相继写作了一些随笔和短论。在杭州及东京时期，他又陆续写作了几篇有关的论文，如《天鹅处女型故事》、《蛇郎故事试探》、《中国的植物神话传说》、《老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和《盘瓠传说考察》等。这些论文，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后，颇受到学者们的注意。60年代前期，他在处境困难的条件下，奋力写成了一系列关于晚清时期学者的民间文学观点、理论的论文。70年代后期以来，他继续撰写了一些有关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文，其中有关于少数民族传说的，如《刘三姐传说试论》；有关于考古学资料的，如《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有关于世界著名神话主题的，如《洪水后兄妹婚再殖人类神话》；有关于中日共同故事的，如《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等。这些论文，从一些侧面，探索了东亚口头叙事文学的性质或意义，也为日、韩等国这方面

的学者所知悉。

钟敬文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民俗学理论，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的成就当然绝不止于这些，但仅从上述几点，就可以了解他对中国这门新学科在理论上的开辟和促进的功绩了。

二、钟敬文社会活动的几个特点

作为一门学科的专攻学者，其在理论上的活动和贡献，当然是最主要的。但是，钟敬文教授在这种学科上的活动远不限于理论方面，而是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为了对他的贡献有全面的了解，还有必要指出他在民俗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社会活动和成果。

（一）不断地致力于民俗学机构的建立

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前期，钟敬文教授就响应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号召，努力于民谣、故事等资料的搜集和编纂，同时也热心地加入学会，成为它的一名通信会员。（因为他当时不在北京）到了中山大学时期，他就热情沸腾地参加了筹建民俗学会的工作，并承担了编辑刊物、丛书和办理民俗学传习班等会务，中大民俗学会初期的学术活动的举办，是与他分不开的。在杭州时期，钟敬文教授又是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者和学会各种活动的积极操办者之一。他对这一时期的编辑书刊和发展会员等工作莫不尽力。新中国建立初期，钟敬文教授为了建设这方面的学术机构，坚决不离开北京，终与周扬先生等合力建成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他被选举为副理事长（郭沫若任理事长），并实际主持工作。由于中央的研究会的建立，全国各省、市很快也成立了分会（或类似分会性质的机构）。这些学术团体，对于中国汉族和五十多个兄弟民族的民间文学的收集、编纂和出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76 年以后，钟敬文教授认为进一步恢复建设民俗学会机构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亲自草拟了建立新中国民俗学会的倡议书，分别请顾颉刚、杨堃、容肇祖、杨成志和白寿彝诸先生签名，呈交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并于中国文联四届代表大会中散发了该倡议书。经过数年的筹备，1983 年 5 月，终于在北京正式成立该会。钟敬文教授被公举为理事长，一直连任到现在。该会成立近二十年来，出版了民俗研究的会刊，扶助了各省市分会的成立，现各省、市、自治区的分会数量已达全国省、市、自治区总数的 2/3 以上。有的省、市、自治区所辖的地区和县级单位也成立了同类的学术团体。这些机构，大都拥有一定的成员，并尽力于地区性的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现在各省、市、自治区都正在编辑、出版省、市、自治区新方志，其中大都包括民俗志部分，有的已出版发行。（如河南、山东、广西、江西等）这些机构的普遍建立，大大地促进了全国性的民俗资料的搜集和出版工作，乃至促进了民俗学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与钟敬文教授长期致力于民俗学机构的建立与加强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

（二）殚精竭力于民俗学的教育事业

钟敬文教授在杭州工作期间，一方面致力于民俗资料的搜集出版和民俗理论的探索，另一方面，又殚精竭力于从事民间文学的教育工作。他在那个具有特殊性的教育机关（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里，首先为它的民众教育行政专修科的学生讲授《民间文学纲要》，后来又为师范科的学生讲授“民间故事研究”。他在这前后，还为该校的《民众教育季刊》（后改为“月刊”）发表了几篇论文，并为它编辑了一些专号（如《民间文学专号》、

《民间艺术专号》、《民间民俗文化专号》)及几册“民间文化小丛书”。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中山大学及香港达德学院任教,都讲授过“民间文学”这门功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职,所教功课之一,就是民间文学。他同时还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文系兼授此课。1953年,他招收了一批民间文学(当时借用俄罗斯的名称,叫“人民口头创作”)研究生。这批毕业研究生后来大都成为我国这方面教师的骨干。1979年,他又招收了一批攻读民间文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于1982年毕业。从1981年起,钟敬文教授所领导的北师大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被教育部定为这方面(包括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博士培养授予点,也是全国本学科唯一的博士点。20年来,这个教研室培养了大批博士、硕士研究生。此外,他还致力于国内高校的这门学科的教材建设。1979年,他受教委的委托,主办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同时主动领导学员们共同编纂《民间文学概论》这一大学文科教本,于当年完成。多年来,此教本一直被使用着。20年后,他为使国内大学能普遍开设“民俗学”的课程,又组织力量,编纂出版了《民俗学概论》(1998)。钟敬文教授所主编的这些新教材,不但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也在教学实践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实践证明,钟敬文教授的努力是有它的客观根据和社会效应的。

(三) 自己长期致力于并积极号召国内对民俗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

钟敬文教授在青年时代就大力从事民俗资料(主要是民间文学资料)的搜集、整理,他早年出版的一些民歌集、故事集,就是一种明证。他的这种意念和活动一直持续着,晚年还有越老越起劲的样子。在广州和杭州时期,他因为编辑刊物、丛书,从事了搜罗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活动,几乎达到一种高潮的程度。在中大后期和达德学院时期,他虽然没有亲自去做田野作业,但也不忘利用教课的方便,向来自四方的学生进行收集活动。1949年到北京后,他利用与彭燕郊共同编辑《民间文艺》(《光明日报》副刊,周刊)的机会,征集了不少资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这种搜集的道路更为广阔,经会内同人整理或协助地方搜集者整理出版的作品集也不少。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钟敬文教授等举办了几次讲习班。他亲自主持演讲,指出资料搜集工作的重要性,并希望学员们做勤苦的搜集者。自80年代中期以后,他参加了周巍峙先生领导的全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套志书集成编纂工作,并主编其中的“故事卷”。这是一项保存和弘扬民族传承文化的伟大工程,它的历史文化意义,决不是仅限于中国的,而是亚洲的,乃至世界的。钟敬文教授以此生余年得为这种民族文化的伟大工程尽力而深感快慰,认为大大地满足了他那为之努力了大半生的学术心愿。

(四) 致力于民间文化的国际交流

虽然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但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又有赖于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国是世界上开化较早的民族之一。从文献上看,在殷、周时代,中国就已经与境内和周边的民族(部族或氏族)有过接触和交往,因而在文化上也就有交流。后来中国也受到印度、阿拉伯等文化的影响,自己也影响了东亚的日、韩、越(南)等民族。到了近现代,这种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就更加广泛了。民俗是民族的中下层文化,它的交流往往要比民族的上层文化的交流更为充分和深入,(虽然它不一定都有明显的踪迹可查考)因此,对它的学术研究也就更加重要。钟敬文教授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当时在杭州参与编刊了一些杂志和丛书,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

意。例如德国的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博士，就是因为看到这些出版物而自动来信和寄赠刊物，跟钟敬文教授等建立了学术友谊的。当时日本民俗学会的月刊《民俗学》的编辑们，也因此与钟敬文教授等互赠书刊，钟敬文教授和娄子匡并曾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钟敬文教授在东京时，曾应邀参加过彼国学者所创办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恳谈会，并作过题为《中国现代的民间文学运动》的讲演。该会的成员，已故实藤惠秀教授，此后长期与钟敬文教授书信来往和互赠书刊。增田涉、竹内好诸教授，直至70年代，还与钟敬文教授有书信流通。1976年以后，中国的闭关政策结束，日本民俗学家臼田甚五郎、直江广治、伊藤清司、大林太良和野村纯一等教授，于1980年中旬，以中国民话之会访华团的名义来中国访问，钟敬文教授等曾代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负责接待，并举行了中日民间文学讲座，由两国学者相互介绍了本国的学术现状。这是两国民俗文化交流的新开始。此后，两国民俗学家的互访就很频繁了。1991年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日民俗比较研讨会，钟敬文前往参加并发言。此后，日本民俗学者和中国民俗学者的交往日益增加，前来中国搞田野调查或学习民间文化的日本中青年学者也络绎不绝。这种盛况是过去所没有的。促成双方交流盛况的原因，当然有多种，钟敬文教授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不能不说是主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钟敬文教授在民俗学理论研究和社会活动上的成就是值得称述的。他一生的奋斗，不仅对中国学术界是一种可贵的贡献，而且对于东亚乃至各国民间文化的理解和阐明，也是一种有益的“他山之石”。

[收稿日期] 2002-04-08

[作者简介] 董晓萍（1950~ ），女，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北京 100875

Zhong Jingwen ' s Theoretical Study of Folklore and His Social Activities

Dong Xiaoping

Abstract :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Zhong Jingwen ' s achievements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folklore and in social activities.

Key words : Zhong Jingwen ; the theory of folklore ; social activities